

河图的“绿图”别称、“绿字”形态之生成与流衍¹

郭思韵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

摘要

自东序河图失落以后，有关河图的认知便已出现断层，后人所描述的形态基本皆是在东序河图的基础上会同各种行世传说揣度而成。所谓“洛出丹书，河出绿图”，自汉以降，大抵均将河图别名“绿图”之“绿”理解为绿色义，乃至又从中衍生出“绿字”一称，以与赤字的洛书相对。而这与当时的文化观念并不相符，全然是因所用文字而造就的、名与实间牵强附会下衍生出的后天属性，其因牵会所造成的矛盾及破绽，在文献中是有迹可循的，尤其将河图之绿一说的发挥宣扬者——以“考命符授河”见长的《尚书中候》中，更是大有体现。甚至到得后来，“绿字”的名谓及形态还在禹受图或受书的纠缠间被附会、赋予到洛书身上。凡此种种，足见世人牵会之能事。

关键词：河图、绿图、绿字、尚书中候、讖纬

¹ 本文初稿曾于“第六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暨纪念黄永年先生九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联办，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所承办，2015年10月17日—18日。

The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He Tu's Alternative Name 'Lv Tu' and 'Lv Zi' Form

KOAY Su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New Era College.

Abstract

Chasm has occurred in human cognition about He Tu since the lost of Dong Xu He Tu. The forms of He Tu in the later generations' descriptions basically were all formed from speculations based on Tong Xu He Tu coupled with various legends. As is said, "Luo produces Dan Shu, He produces Lü Tu", since Han, the term "Lü" contained in He Tu's alternate name, "Lü Tu", is usually construed to mean the colour "Lü", giving rise to the name of "Lü words" to correspond with the Luo Shu with words in Chi colour. This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cultural concept at that point of time. Such attribute was not inborn but was however acquired through strained linkage between name and reality due to the words used in He Tu. There are signs of inconsistency and flaw arising therefrom i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in particular, in "Shang Shu Zhong Hou" which is well noted for "Kao Ming Fu Shou He", the promoter and enhancer of the saying about He Tu's Lü. Subsequently, the name and form of "He Tu" were even, in the entanglement on whether Yu accepted Tu or Shu, strained and conferred to Luo Shu. All these show how good humans are in making far-fetching linkage.

Keywords: He Tu, Lü Tu, Lü Zi, Shang Shu Zhong Hou, Chen Wei

在《淮南子·俶真训》“洛出丹书，河出绿图”²的对文以及《尚书中候》中河图“绿错”、“绿字”、“绿色”的形态描述与渲染下，自汉代以降，大抵均将河图别名“绿图”之“绿”理解为绿色义，乃至又从中衍生出“绿字”一称，以与赤字的洛书相对。“绿图”、“绿字”作为河图形态兼别称可谓深入人心，不仅广被古人认可并屡见于诗文中，迄今学界对此也基本无所疑虑。但实际上，“绿图”一名原与“绿色”毫不相涉，河图的“绿字”形态，全然是因所用文字而造就的、名与实间牵强附会下衍生出的后天属性，这在文献中是有蛛丝马迹可考的。此外，能以牵会之身而被津津乐道数千载，自也有不容忽视的因素。试论如下。

一、东序河图的失落与绿图一称的出现

《周书·顾命》有云：“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³作为现存文献中最早可见的“河图”记载，东序河图的真貌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原始河图的形态，惜乎《尚书》并未对其有更多着墨。清胡渭《易图明辨·河图洛书》曾有如下论述：

河图藏诸天府，不知何时遂亡。初意秦昭襄王取周九鼎宝器时，河图并入于秦。及项羽烧秦宫室，与府库俱为灰烬。此其所以不传也。今年客京师，与四明万君季野（斯同）论及此事，万君曰：“幽王被犬戎之难，周室东迁，诸大宝器必亡于此时。河图，无论后人，恐夫子亦不及见。”余闻而赍之，顷检《周本纪》云：“犬戎杀幽王骊山下，虜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赂即珍宝货财也。可见河图实亡于此时。故自平桓以下，凡《顾命》所陈诸宝器，无一复见于传记。而王子朝之乱，其所挟以出者，周之宝珪与典籍而已，天府之藏无有也。河图亡已久，虽老聃、苾弘之徒，亦未经目睹，故夫子适周，无从访问，赞易有其名而无其义。所谓“疑者，丘盖不言也”。⁴

胡渭点破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东序河图失落以后，有关河图的认知便已出现断层。纵然现存文献中孔子已是继《顾命》之后最早言及河图者，其“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礼运》⁵）⁶与“凤鸟不至，河不出图，

² 刘安编，张双棣校释：《淮南子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7页。

³ （题）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十八，载《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39页。

⁴ 胡渭：《易图明辨》，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28页。

⁵ 案：《礼运》篇见载于《礼记》、《孔子家语》，据杨朝明考证，应出于“言偃自记”，且此次谈论的时间则当在“鲁定公十年到十二年三年之内的某年十二月”。详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

⁶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二十二，载《十三经注疏》，第1427页。

吾已矣夫”（《论语·子罕》）⁷的说法，恐怕也更多是建立于传闻与揣度，及由“顾命”国之宝器的象征意义所导出的推想上，以之作为一种寓意“德祥”的珍稀“宝器”，乃圣王德治之征应。⁸其后《墨子》、《管子》等的河图记载，明显均亦是在此基础上会同各种行世传说与时代思潮继续发挥的，天命授受的意味越见浓厚。基本上，诸多揣度纷纭众说中的所谓河出之图，与已失落的东序河图，除了名谓的雷同外，似再无其他证据来说明它们有所关联。

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之中出现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广被后人认可的河图别称兼形态——绿图。《墨子·非攻》有“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武王践功”⁹的记载，这个“绿”图，一说为绿色（包括绿字、绿错），一说通“录（録；下同，不再出注）”¹⁰或“篆”（籀；下同，不再出注）。

有关河图别名绿图、录图的问题，陈槃《古讖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曾作有如下解说：

河图所以又名绿图者，从其图书之颜色言之耳，……河图文字色绿，洛书文字色丹，故《淮南傲真》篇以为“洛出丹书，河出绿图”矣。“绿”或作“录”者，荀子性恶篇：“桓公之葱，文王之录”。杨注：“葱，绿色也。录与绿同。二剑以色为名”。盖二字声同，字通，故或作“绿”，或作“录”，不拘也。然“录”复有箴记之义，与“图”字可以互文，故有河图之录之说，……按河图之文，可以称河图之录；然则简称自得曰录图。绿图之又名录图，此亦可备一义。¹¹

《墨子·非攻》言：“武王伐殷有国，河出绿图。”此言绿图，亦即河图。西周武王时已有河图，则河图尚矣，何云始自始皇之世？曰：不然。西周之所谓河图，盖河中所出石玉之类之有纹理者。秦汉间方士之所谓河出尺二玉牒之类，盖其遗义也。如《墨子》此文，则西周河图，纹理作绿色。而秦汉间所托之河图，其图书或云“赤文绿错”，有“绿图”之称，盖亦依古义也。¹²

⁷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九，载《十三经注疏》，第2490页。

⁸ 按：《周礼》曰：“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是陈之即藏而非随时鉴省，这就意味着东序河图的用处，是重在摆设式的象征性而非匡辅式的使用性上。就要义旨归而言，将君王德治与东序河图挂钩，无疑是顺理成章的。

⁹ 吴毓江校注：《墨子校注》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17页。

¹⁰ 按：《艺文类聚·祥瑞部上》即引作“录”。详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九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95页。

¹¹ 陈槃：《古讖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台湾：国立编译馆，1991年，第258页。

¹² 陈槃：《古讖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第373-374页。

陈槃析论河图的“绿图”之名，以其源自绿色文字、纹理，所采取的显然是逆推反证的方式，即通过《淮南子》中与“洛出丹书”相对的“河出绿图”的记载以及祖述河洛的讖纬文献中对河图“赤文绿错”的描述，来解读《墨子》的“河出绿图”，这当然也与后世以“绿字”指称河图的现象不无关系。但正如前文所言，《墨子》此文自古以来学界便存有争议，诸说相持不下各有理据且均源远流长，而若从河图形态集大成者的讖纬文献之相关记载来逆推论证，则更皆合事实。但如将讖纬的写作原则纳入考量，这一切却很有重新审视的必要；而若再细考讖纬文献相关记述的诸般行文，更不难发现，河图的“文字色绿”此说很可能是为了牵会“绿图”之名而衍生的属性。

二、讖纬文献中的河图形态设想与意图

讖纬中虽有不少经过偷换、改动、移植概念的记载，但其题材多是由来有自的。以河图形态为例，在讖纬文献中确有着相对详尽的描述，然而细嚼其所展示的特性，却明显极是呼应、声援流传于时世的河图众作之情况特征及其相关历史记载。这种态度，当是为了回避、减轻可能招来的质疑——诸如它们的真实性等问题。故讖纬中的河图形态之设想大抵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的特性：

一、呼应史料，不违背世人共有的认知。如《尚书中候》谓尧时“龙马衔甲，赤文绿色，自河而出，临坛而止，吐甲回滞。甲似龟，广九尺，有文言虞、夏、商、周、秦、汉之事。帝乃写其文，藏之东序。”¹³这段文字明显是由《尚书·顾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及《礼运》“河出马图”的记载敷衍发挥而成，并又兼顾了《墨子》的“绿图”及《吕览》的“上知千岁，下知千岁”¹⁴之说。

二、同步内容，与行世河图诸作所载的内容类别保持一致。讖纬中对古河图所载内容的描述，无论地图、星图、帝纪图表、兴亡之名、代之矩等等，其实大都由行世可见的图讖类作品之内容类别所逆推设想而得。

三、隐秘原型，避免内容被印证的可能。起初最常见的，便是“写而竟去”、“书成文消”的模式，这在《尚书中候》及其注文对洛龟丹书的叙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周公沉璧，玄龟青纯。含光刻背甲书，止洛于坛，赤文似字，周公视，周王乃视，龟留不去，周公援笔以世文而写之，书成文消龟去。¹⁵

¹³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董治安主编：《两汉全书》第33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008页。

¹⁴ 吕不韦等著，王利器注疏：《吕氏春秋注疏》卷二十，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2602页。

¹⁵ 睢县悉达：《开元占经》下，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1199页。

案：“世文”一作“时文”¹⁶，皆时世文字之意。《河图》诸讖亦有类似记载：

	出处	文本
1	河图挺佐辅	黄龙负图，鳞甲成字，从河中出，付黄帝。令侍臣写，以示天下。 ¹⁷
2	龙鱼河图	大龟负图来，出授尧。尧敕臣下写取，写毕，龟还水中。 ¹⁸
3	河图	黄龙从雒水出，诣虞舜，鳞甲成字。舜命写之。写竟，去。 ¹⁹

按此设说，河洛图书并非龙龟携来的成品，其原始形态为鳞甲文理，而得以留存于世的从一开始便只是二手文献，即河洛临观者以时世文字写成的版本，亦后人所能亲睹的“本文”（正文）之古本。至于作为原型的鳞甲文字，书成后即已不复得见，外人、后人自也无从追踪来历、印证内容虚实。而其中的“示天下”之举，更为野间随时冒出的各类河洛作品留下宽裕余地。

讖纬中的不少记叙描述一般被看成是虚构之言，但它大都有根源可以稽考，基本是由各种记载或见闻敷衍而成的。²⁰正因为它们各有所依据的根源，才造就了讖纬中众说纷揉乃至彼此矛盾莫能识真的各种河图传说与形态，而况有时同一根源也还能敷衍出分歧来，如《墨子·非攻》的“绿图”与“录图”之争即是。无论如何，讖纬的各种河图之形态并不能用以逆推反证早期的河图诸说之原貌，这是在相关论断中应持有的基本认知。反倒是讖纬中一些牵强附会自相矛盾难以圆说的思路内容，却能间接揭示出某些说法究竟是近正抑或迂妄，如河图别称“绿图”及“绿字”之说的生成与流衍便是一例。

¹⁶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6页。

¹⁷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4册，第19744页。

¹⁸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4册，第19716页。

¹⁹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4册，第19615页。

²⁰ 按：详拙著《汉代讖纬研究——以渊源流变、内容构成及对文史写作的影响为中心》中编第十一章第三节三《凿衍的假相：史料的虚实增损牵会权变》，北京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

三、“绿图”、“绿字”说的存在与生成

现存可见先秦文献曾书作“绿图”者，主要是以下三者：

条	出处	文本
1	墨子·非攻	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武王践功。 ²¹
2	随巢子	姬氏之兴，河出绿图。 ²²
3	吕览·观表	非独相马然也，人亦有征，事与国皆有征。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意之也，盖有白云也。绿图幡薄，从此生矣。 ²³

例第1、2条中的“绿图”都未表现出明显的绿色之图或录书与图的倾向，²⁴而《吕览》中和圣人有关的“绿图”则与陆贾《新语》中所言的“图录”在明显同属一事，读作“录图”——圣人“按纪图录”²⁵的成果无疑要比义取绿色的“绿图”来得合适。但无论如何，由于诸书皆作“绿”，故即便是“录图”也不能否决它同兼绿色的可能。于是以此“绿”字为根源及分歧点，衍生出绿之图、录与图两说，并经由与洛书的搭配成对——绿图丹书、录图变书，将各自的取向体现得越加分明。

最先将河图之绿的特性渲染出来的，固然是《淮南子·俶真训》的“洛出丹书，河出绿图”²⁶，但真正将此说发挥宣扬者，则当属以“考命符授河”²⁷见长的《尚书中候》。针对河图之绿，今存可见的《中候》佚文涉及了“赤文绿错”、“赤文绿字”、“赤文绿色”三种说辞：

²¹ 吴毓江校注：《墨子校注》上，第217页。

²² 《随巢子》佚文，载孙贻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40页。

²³ 吕不韦等著，王利器注疏：《吕氏春秋注疏》卷二十，第2602页。

²⁴ 按：《随巢子》不过沿袭《墨子》之说。

²⁵ 陆贾《新语·本行》：“（夫子）追治去事，以正来世；按纪图录，以知性命；表定六艺，以重儒术。”陆贾著，王利器注释：《新语校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2-143页。

²⁶ 刘安编，张双棣校释：《淮南子校释》，第157页。

²⁷ 《孝经援神契》，载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两汉全书》第34册，第19502页。

	受者	文本
1	黄帝	河出龙图， 赤文绿字 ，以授轩辕。 ²⁸ 河龙图出，洛龟书威，赤文象字，以授轩辕。 ²⁹
2	尧	帝尧即政，荣光出河，休气四塞。龙马衔甲， 赤文绿色 。甲似龟背，五色，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案：一作“赤文绿字”，惟据注文，当为“绿色”。）【郑玄注】甲所以藏图，……其文赤色而绿比也。（案：一作“赤文色而绿地也”、“其文赤而绿”。） ³⁰ 龙马见，其身赤色，龟背袤广九尺，五色，颡下有红，赤文似字。 ³¹
3	舜	舜乃设坛于河，如尧所行，至于下稷。容光休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置于坛畔， 赤文绿错 。其文曰：禅于夏后，天下康昌。 ³² （案：一作“出水坛畔，赤文绿字” ³³ ，惟据注文，当为“绿错”。）【注】错，分也。赤（一作“文”）而以绿色分其间。 ³⁴
4	禹	禹观于浊河，而授 绿字 。 ³⁵

很显然的，河图文字的既赤且绿委实是一种极其矛盾的形态。撇开纯粹以“绿字”代称河图的第4条不谈，黄帝、尧、舜的河图无论再怎么称是“赤文绿字”、“赤文绿色”、“赤文绿错”，其所载的文理内容之主体皆同以赤色显现，这是众口一词并无异议的。而相对的，“绿”的地位就显得异常尴尬，“赤文绿字”所描述的既赤且绿之文字形态无疑极其矛盾，而规避了这一矛盾的“赤（文）而以绿色分其间”、“其文赤色而绿比（地）”另两说，则仿佛便是为了牵会河图的“绿”之别称而勉强为之，必欲将绿色属性掺入其中，尤其在对比洛书形态之后这种牵会感就更加强烈：

²⁸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400页。

²⁹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3册，页18998。

³⁰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402、405页。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3册，第19005页。

³¹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405页。

³²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3册，第19013页。

³³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406页。

³⁴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428页。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3册，页19011。

³⁵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3册，第19006页。

	受者	文本
1	黄帝	河龙图出，洛龟书威， 赤文象字 ，以授轩辕。 ³⁶ 黄帝巡洛，龟书 赤文成字 ，象轩。 ³⁷ 黄帝东巡至洛，龟书咸，赤文绿字，以授轩辕。 ³⁸
2	尧	赤光起，玄龟负书出，背甲 赤文成字 ，止坛。 ³⁹
3	汤	汤沈璧于河，黑龟出， 赤文题 。 ⁴⁰
4	周	成王顾于洛，沈璧。礼毕，王退，有玄龟，青纯苍光，背甲刻书，上跻于坛， 赤文成字 ，周公援笔，以世文写之。 ⁴¹ 周公沉璧，玄龟青纯。含光刻背甲书，止洛于坛， 赤文似字 ，周公视，周王乃视，龟留不去，周公援笔以世文而写之，书成文消龟去。 ⁴²

河图“赤文绿字”的描述，实则是从洛书“赤文成字”的样式相对而来的，以见彼此之相别相成。“赤文成字”即前引讖纬诸作所言“鳞甲成字”⁴³一类，文即纹理，故大都由龙、龟、鱼呈现，且多属临时成字，遂又有“象字”、“似字”之语，如第2条的“背甲赤文成字”正是上述模式的体现。“赤文成字”一说与前文曾论的“书成文消”设定显然是彼此呼应相成的。这种套路并不限于龙图龟书，如《洛书灵准听》云：“武王伐纣，度孟津，中流，白鱼跃入王舟。王俯取鱼，长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纣可伐。王写以世字，鱼文消。”⁴⁴此亦谓为丹书也。

³⁶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3册，第18998页。

³⁷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400页。

³⁸ 同上注。

³⁹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3册，第19009页。

⁴⁰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3册，第19017页。

⁴¹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3册，第19026页。

⁴² 睢县悉达：《开元占经》下，第1199页。

⁴³ 《录图》：“承水而王……善则则景云至，龟龙被文，皆水气为祥也。”《礼斗威仪》“乘土而王者，……龟被文而见也”郑注云：“被文谓甲文成字。”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3、34册，第19095、19619页。

⁴⁴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4册，第19784页。

四、河洛图书的“赤文”形态之渊源

文字的赤色形态，其来源极早。以朱丹颜料涂写文字，是远自殷商便已存在的现象。1936年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了武丁时期甲骨窖穴（YH127坑）伊始，便已知道商代的甲骨文字，原有不少是以朱墨颜料书写文辞和填涂刻辞的；而1985年刘家庄殷墓出土的八十片朱书玉璋，⁴⁵也表明了玉铭亦在此之列。就春秋战国的情况来看，启示告昭契约等一类内容，基本都倾向于使用丹书朱字，如1965年山西侯马市晋城遗址发掘的五千余件玉石盟书中，便有绝大部分是丹书朱字，墨书黑字只有少量，主要为非正式盟书或与盟誓无关的诅咒、卜筮类内容。⁴⁶盟书在当时被称作“载书”，《管子·小匡》云：“与诸侯饰牲为载书，以誓要于上下荐神。”⁴⁷《周礼》曰：“诅祝掌盟、诅、类、造、攻、说、禴、祭之祝号。作盟诅之载辞，以叙国之信用，以质邦国之剂信。”“司盟掌盟载之灋。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既盟，则贰之。”郑玄注：“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明神，神之明察者，谓日月山川也。……诏之者，读其载书以告之也。贰之者，写副当以授六官。”⁴⁸概言之，载书正本的存在乃是为了荐诏于神以为见证，《左传》襄公九年的这段文字即将此意展现无余——“荀偃曰：‘改载书。’公孙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⁴⁹

丹书朱字既作为相关仪式中默认采用的体例，则在时人眼中显然有着非同一般的庄重意味，并且这种特殊性是广被世俗认同的，如《吕览·应同》谓“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⁵⁰，此丹书《墨子·非攻》有更详细的描述——“赤乌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⁵¹，此即朱书玉片之属。后来陈胜、吴广基于“先威众”的意图即曾“（以）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待人发视，⁵²被班固称为“符命之起”⁵³、新莽《符命》总说自诩为“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皇天眷然，去汉与新，以丹石始命于皇帝”⁵⁴的武功丹石——“前辉光谢器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⁵⁵大抵亦仿行如是。谶纬同样将此发挥得淋漓尽致，诸如“黄鱼双跃，出躋于坛。黑鸟以雄，随鱼亦止，化为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命之子

⁴⁵ 详孟宪武、李贵昌：《殷墟出土的玉璋朱书文字》，《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⁴⁶ 详《侯马盟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周积明、张林川主编：《中华发明发现大典》，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⁴⁷ 颜昌峒：《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200页。

⁴⁸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六、三十六，载《十三经注疏》，第816、881页。

⁴⁹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载《十三经注疏》，第1943页。

⁵⁰ 吕不韦等著，王利器注疏：《吕氏春秋注疏》，第1279页。

⁵¹ 吴毓江校注：《墨子校注》上，第217页。

⁵² 《司马迁：《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50页。

⁵³ 班固：《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079页。

⁵⁴ 班固：《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13页。

⁵⁵ 班固：《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第4078页。

伐桀，命克子，商灭夏，天下服。’三年天下悉合”（《中候》）⁵⁶、“吕尚出游于口，戊午，赤人雄出，授吾简，丹书曰‘命由吕’”（《中候》）⁵⁷、“泰伯出狩，至于咸阳，天震大雷。有火流下，化为白雀，衔录丹书，集于公车。公俯取书，书曰：秦伯，霸也”（《中候》）⁵⁸、“孔子坐玄扈洛水之上，赤雀衔丹书随至”（《春秋纬》）⁵⁹等。

综上所述，可见洛出“丹”书之说完全合乎情理，反倒是河出“绿”图颇显诡异。如前云，河图无论再怎么极言其“绿”，都无法动摇“赤文”承载内容的主体地位。反倒是“绿”之属性欠缺稳定、少有共识，或曰“绿字”或谓“绿色”或云“绿错”，随性得很，似乎只求掺入“绿”义以使其无妨于“绿”名就行。而况若按“丹书”、“丹石”之类的命名规则，即便河图果真“绿色分其间”、“绿比（地）”，就主体来说似也还是应谓之“丹图”才对——至少“丹图”一词还曾见于《周礼》⁶⁰，而绿书或图的作品形态于先秦，除《墨子》、《随巢子》取义不明的“河出绿图”外却是再无所闻，更毋论与“丹书”的源远流长相较了。至于“绿字”之说则最为诡异，若说洛书之“赤字”是源自于其“赤文成字”、“赤文象字”、“赤文似字”、“赤文题”，那么强将相类结构的“赤文绿字”、“赤文绿色”、“赤文绿错”之河图，说成迥异的结果“绿字”，无疑是匪夷所思的，所谓“赤文绿字”，其呈现的文字究竟是赤耶绿耶？凡此种种，都不能不令人置疑，是否正因传世文献写作“绿图”，且时又传有“丹书”盛事，遂使将此“绿”读如字的后人不得不缘此强作牵会，终成“洛出丹书，河出‘绿’图”之说。又，洛龟丹书的文之“成字”、“像字”、“似字”，都意在展示一种天然文理的组构性，象征着非人为的天命启示，相形之下，河图的“绿色”、“绿错”、“绿字”除了满足“绿”属性的追求外，不仅无甚深意，甚至不免对上述特性有所损伤。

从现代以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物来看，疑《中候》所载的“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甲似龟背，五色，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⁶¹、“有文言虞、夏、商、周、秦、汉之事”⁶²云云的尧时河图，最初是

⁵⁶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3册，第19017页。

⁵⁷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3册，第19021页。

⁵⁸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3册，第19030页。

⁵⁹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3册，第19167页。

⁶⁰ 按：《周礼》有“丹图”一词，其载“司约”职掌云：“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治神之约为上，治民之约次之，治地之约次之，治功之约次之，治器之约次之，治摯之约次之。此六约者，诸侯以下至于民，皆有焉。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郑玄注：“大约剂，邦国约也。书于宗庙之六彝，欲神监焉。小约剂，万民约也。丹图，未闻。或有彤器簠簋之属，有图象者与？《春秋传》曰：‘斐豹，隶也，著于丹书。’今俗语有铁券丹书，岂此旧典之遗言与？”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十六，载《十三经注疏》，第880-881页。

⁶¹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402页。

⁶²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3册，页19008。

由填朱刻辞的龟甲原型敷衍而成的，如YH127坑出土的一万七千余片甲骨，其内容之广泛即涉及了当时的天文、历法、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昔人或有所得之，辨识一二，讹传之下逐渐推展成“文言虞、夏、商、周、秦、汉之事”、“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一类无所不包的模式，似也不足为奇。若果如是，则就更衬托出其“绿字”、“绿色”、“绿错”之说，最初原系牵会迂妄了。而况若欲说龙马所衔龟甲图文之绿或者与“玄龟青纯”——“纯，绿也，谓纯绿千岁龟也”（注引何休解）有关，倒也并非不可能，但如此一来，“绿”也当是洛龟之书同具的特色才是，而后者却始终维持着稳定的“赤文成字”、“赤文似字”、“赤文像字”形态。尽管《河图玉板》亦有“临于元扈洛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⁶³之语，但一望即知是混同与所谓“绿图”的描述，且竟还将两色倒置——原作“赤文绿字”、“赤文绿色”、“赤文绿错”，只能说是河图的“绿字”概念误导甚深，毕竟若按龟书的本色——“有玄龟，青纯苍光，背甲刻书，止跻于坛，赤文成字”⁶⁴，再怎么着也该是青甲丹文才对。

又，河洛图书的赤文形态还可能与“载书”有关，就先秦文献来看，载书正本除了“埋之”（案：侯马盟书即此类）外，见诸记载的昭告神明方式更多是沉入河中——《国语·晋语》：“子犯授公子载璧，曰：‘臣从君还轸，巡于天下，怨其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不忍其死，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质。”⁶⁵又《左传》定公十三年荀跖言于晋侯曰：“君命大臣，始祸者死，载书在河。”⁶⁶而这其实与广见于后世讖纬的图书授受常礼“沉璧河洛”——“周成王举尧舜礼，沈璧于河，礼毕王退俟，至于日昧，荣光并出，暮河，白云起而青云浮至，乃有青龙临坛，衔玄甲之图，吐之而去也（《中候》）”⁶⁷颇为相类。据《中候》，“帝尧刻璧，率群臣东沈于雒，书曰‘天子臣放勋，德薄施行不元’”⁶⁸，而《帝王世纪》载此事云：“帝尧，……纳舜于大麓。后年二月，又率群臣刻璧为书，东沉于洛，言天命当传舜之意，今《中候运衡》之篇是也。”⁶⁹《宋书·符瑞志》则称：“后二年二月仲辛，率群臣沈璧于洛。礼毕，退俟，至于下昃，赤光起，玄龟负书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于坛。其书言当禅舜，遂让舜。”可见在时人的眼中，人类既能沉玉昭心迹与大神，大神自亦能以类似手段给予回应。此外，这些被沉入河洛之水的“璧书”，未必没有重见天日、再现于世的可能。这些大抵也是河洛出图书之模式所取资于、流衍自的重要原型。

⁶³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4册，页19726。

⁶⁴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3册，页19026。

⁶⁵ 《国语·晋语·秦伯纳重耳于晋》，载（题）左丘明著，韦昭注：《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8页。

⁶⁶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六，载《十三经注疏》，第2150页。

⁶⁷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3册，第19026页。

⁶⁸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3册，第19009页。

⁶⁹ 皇甫谧：《帝王世纪·五帝》，第13页，载刘晓东等点校：《二十五别史》，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

在此基础上，河图的“绿”色之说实属无稽，这不仅表现在此说本身的条理矛盾，且亦与当时的文化理念不相符。张清常《汉语的颜色词（大纲）》一文有如下论述：

在春秋战国时代，古人就已经形成了一套观念，有正色，间色。正色指赤黄青白黑。此外（例如红绿紫绛）都是间色。从历史发展上看，正色可能是在古代染色工艺还不太十分发达时期，较早得出的较朴素的颜色。而间色却是在上述正色（可以说是基本色调）配合得出的较鲜艳的颜色。上文1.1.3说过，甲骨文没有“绿”字，一下子黄与青混合得出绿色，⁷⁰就十分漂亮，所以《诗经·邶风·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里”“绿衣黄裳”，可能正是描写美女穿了当时最新流行色翠绿色，与黄色相配，给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美人已逝，才有“我思古人”的话。不是“悼念亡妻”，也是情诗。就原诗而论，应该是如此理解。上文1.2提到春秋时把赤与青混合得出紫色，齐桓公穿了，轰动全国，紫色马上成为流行色。事物的发展总是这样的。⁷¹

甲骨刻辞的涂朱（或墨）、主用朱字的“载书”乃至赤雀所衔授命之文之所以是“丹书”，都反映了这种颜色观在三代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至少在与荐诏神明、授受天命、契约盟誓一类的肃穆之事上，有着相当严格的规定或自觉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承载天命的河图委实很难有可能与文化底蕴太过薄弱的“绿”色构建联结。

五、《中候》“绿字”之说及其异文考

事实上，在河图的三种“绿”之形态——“绿色”、“绿错”、“绿字”中，反倒是后人印象最深、接受最广的“绿字”这一说辞，其在原版《中候》的具体存在及其用法，还是很值得思虑、质疑的。现有的《中候》佚文基本全从它书辑得，这就意味着它们有时将不免于后世语境的制约与影响，尤其在断章引文及综述之际。今存可见、来源各异的《中候》残文中，在黄帝、尧、舜、禹的河图授受之事的记叙上，都曾有过“绿字”的异文说辞。然而正如前文引例时所言，仅需通过简单的注文参考即可看出了尧、舜之河图原应各作“赤文绿色”、“赤文绿错”而非“赤文绿字”，故以下仅论黄帝与禹。

安居香山本《纬书集成》的《中候》辑有“河出龙图，赤文绿字，以授轩辕”句，所注文献来源为“占120、敦煌遗书祥瑞图说残卷”，⁷²然查《开元占经》卷一百二十“龙鱼虫蛇占”的“龙”目下为“河出龙图，赤文像字，以授轩

⁷⁰ 按：《说文·糸部》：“绿，帛青黄色也。”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49页。

⁷¹ 张清常：《语言学论文集·续集》，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第91-92页。

⁷²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400页。

辕”（案：倒是“龟负图”目下作“黄帝东巡至洛，龟书咸，赤文绿字，以授轩辕”），⁷³而敦煌遗书《瑞应图》则是“河龙图出，赤文象字，以授轩”⁷⁴，故实不知其何所据也。唯《异鱼图赞笺》卷二“龙鱼”引《中候》，作“河龙出图，成赤文绿字，以授轩辕”⁷⁵。

对《中候》内容的考辩，其实不妨借重《宋书·符瑞志》。尽管《宋志》未称出处，但细察个中情节文字，不难发现其对历代帝王圣者的河洛图书授受之事基本是取正《中候》的，其文曰：“雾除，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⁷⁶暂且按下异文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文中，河图洛书是在同一机遇里为黄帝并得，故亦被作者并云，与其后文对尧的记事方式迥异。⁷⁷《水经注》虽也未称出处，但情况大抵相似——“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坛沈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字”⁷⁸，而《艺文类聚》、《太平御览》题为《中候》，皆云：“河龙图出，洛龟书咸（一作成），赤文像字，以授轩辕”⁷⁹，此句《瑞应图》、清河郡本《纬书》均作“赤文象字”⁸⁰。综上所述，至少有“绿字”、“篆字”、“象字”、“像字”四种异文，绿（綠）篆象像皆形近也，《水经注》殿本对“赤文绿字”的注文“绿近刻讹作篆”⁸¹即很好地说明了这点。但实际上“绿字”、“篆字”都是不合理的，赵一清《水经注笺刊误·洛水篇》的“篆起周宣，盖是绿字之误”⁸²已点出“篆字”的不当，而既是河图洛书并云，“绿字”的存在却也同样突兀。倒是“象”或“像”（皆通）最可能是原貌，毕竟若论形近而误，象与篆间及像与绿（綠）间似乎更显自然。

至于夏禹之事，《中候》“禹观于浊河，而授绿字”一句，见于马驥《绎

⁷³ 睢县悉达：《开元占经》下，第1197页。

⁷⁴ 《敦煌遗书》，伯二六八三号，载王重民原编、黄永武新编：《敦煌古籍叙录新编》第8册子部《瑞应图》（校录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334页。

⁷⁵ 杨慎著，胡世安笺：《异鱼图赞笺》，载汪灏、张逸少等：《佩文斋广群芳谱外二十种》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82页。

⁷⁶ 沈约：《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760-761页。

⁷⁷ 沈约《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二月辛丑昧明，礼备，至于日昃，荣光出河，休气四塞，白云起，回风摇，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色，临坛而止，吐《甲图》而去。甲似龟，背广九尺，其图以白玉为检，赤玉为字，泥以黄金，约以青绳。检文曰：‘闾色授帝舜。’言虞、夏、殷、周、秦、汉当授天命。帝乃写其言，藏于东序。后二年二月仲辛，率群臣沈璧于洛。礼毕，退俟，至于下昃，赤光起，玄龟负书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于坛。其书言当禅舜，遂让舜。”第762页。

⁷⁸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73页。

⁷⁹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九十八《祥瑞部上》，第1703页。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九《皇王部四》，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68页。

⁸⁰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3册，第18998页。

⁸¹ 郦道元著，陈桥驿点校：《水经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08页。

⁸² 赵一清：《水经注释》，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59页。

史》卷十一⁸³，又收入《黄氏逸书考》⁸⁴中，但这段文字的本真性也很值得商榷。《中候》残文有关禹收河图的记叙大抵如下：

	出处	文本
1	绎史	《尚书中候》：禹观于浊河，而授绿字。 ⁸⁵
2	太平御览	《尚书中候》：尧使禹治水，禹辞，天地重功，帝钦择人，帝曰：“出，尔命图，尔乃天。”禹临河观，有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表曰：“文命治淫水。”授禹河图，去入渊。【注】言天使汝治水，非我。河图，谓括地象。 ⁸⁶
3	太平御览	《尚书中候》：伯禹在庶，四岳师举荐之帝尧，握括命不试爵授司空。伯禹稽首让于益归。帝曰：“何斯若真，出尔命图示乃天。”伯禹曰：“臣观河，伯面长人首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图。”带足入渊。伯禹拜辞。【注】伯，官称，禹号也，因为德谥。庶，庶人也。四岳，四方诸侯也。师，众也。荐，进也。禹握括地象，天已命之，故不复试以官，司空於周为冬卿，掌制国之五沟，行导水之事。稽首，拜首至手，益归贤者尧臣，归读曰夔也。何不听让之辞。斯，此也。若，汝也。此汝真其人。尔，汝也。禹方让隐之，故言出汝所天命也。图，括地象。示读曰祗，祗，是也。乃天使汝治水，非我也。观河，观于河水也。河图，谓括地象。带足，去也。音带。禹将行，故拜去。 ⁸⁷
附	宋书·符瑞志	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淫。”言讫，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渊。 ⁸⁸
附	水经注·河水	昔禹治洪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图》而还于渊。 ⁸⁹
附	晋书·地理志	昔大禹观于浊河而受绿字，寰瀛之内可得而言也。 ⁹⁰

⁸³ 马骥著，王利器整理：《绎史·禹平水土》，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0页。

⁸⁴ 黄奭：《黄氏逸书考·通纬·尚书中候》，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20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531页。

⁸⁵ 马骥著，王利器整理：《绎史·禹平水土》，第130页。

⁸⁶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七二《休征部一》，第3868页。

⁸⁷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七》，第381页。

⁸⁸ 沈约：《宋书》卷二七，第763页。

⁸⁹ 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第128页。

⁹⁰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08页。

由于注文的存在以及记叙的模式，明显可以看出《御览》所录的禹受河图过程才是最接近本貌的原始情节，而“禹观于浊河，而授绿字”云云，则是对原有事迹情节的提炼总结，或是出自马骥，或是《中候》其他章节回顾夏禹这段旧事时的语句。则此处的“绿字”其实并非对河图实际形态的具体描述，而是河图并其内容的代称耳。又，《春秋元命苞》有仓颉“生而能书，及受河图绿字，于是……指掌而创文字”⁹¹的记载，同样也非是当前情景形态的描述而是回顾总述，谓河图之“录”文也。（案：一说仓颉所受为龟书。）

其实不仅《中候》，河图的“绿字”之说即使在其他讖纬作品中也大多不成立的，即便囿于“绿”属性者也仅在文字以外的方面动手脚，如：

	出处	文本
1	河图	黄帝游洛，至翠妣之泉，龙图兰叶，朱文授之。 ⁹²
2	河图挺佐辅	黄帝游于洛，见鲤鱼长三丈，青身无鳞，赤文成字。 ⁹³
3	河图录运法	鱼泛白图，兰采朱文，以授黄帝。 ⁹⁴

持“绿图”一说者，至多也不过将兰绿介定为背景色，而文字始终是朱赤。而不拘于“绿”者，则又是另一番情状了，像《春秋》诸纬基本是持“录图”之说并将“录”理解为玺文、署文之类的，如《春秋元命苞》曰：“唐帝游河渚，赤龙负图以出。图赤色如锦状，赤玉为柙，白玉为检，黄珠为泥，玄玉为鉴，章曰：‘天皇大帝，合神置署，天上帝孙伊尧龙润滑，图在唐典。’右尉舜等百二十臣发视之，藏之大麓。”⁹⁵既未有“绿”之桎梏，此图遂被设定为“赤色”，盖尧秉火而王也。

六、河图“绿字”之说的影响与变异、流衍

无论如何，河图的“绿图”之名最初并非就其文字之色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在讖纬文献的渲染中，“赤文绿色”（“兰叶朱文”）、“赤文绿错”（“兰采朱文”）都还有一定的理据，惟独“绿字”一说不经推敲。然则恰是这最不合情理的虚托之语，却成为后人印象最深、接受最广的说辞，原本显得随性、各式各样的绿属性，逐渐被统一为“绿字”。只能说，在“洛出丹书，河出绿图”的普遍认知下，由洛书文字色“丹”直接推想成河图文字色“绿”，是再

⁹¹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590页。

⁹²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4册，第19640页。

⁹³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4册，第19744页。

⁹⁴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4册，第19749页。

⁹⁵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3册，第19237页。

自然不过了一——当然这也与谶纬语境中对河图的重“录”（文字）甚于“图”之倾向不无关系。

河图“绿字”之说的影响，在谶纬文献的异文中体现得极其明显，如前文所论，黄帝、尧、舜所受河图的“赤文象字”、“赤文绿色”、“赤文绿错”，都有讹作“赤文绿字”的异文，此处不再赘论。至于河图“绿错”、“绿色”云云之类的其他说法，无疑远不如前者来得直观及对称（与洛书），因此在取舍中被忽视倒也不难理解，如谢朓《侍宴华光殿曲水奉敕为皇太子作诗》的“朱绋叶祉，绿字摘英”⁹⁶以及梁简文帝《马宝颂》的“岂止沉河用璧，独有绿文之称；盛德在木，偏受苍龙之名”⁹⁷，便是明明白白地将河图文字理解为绿色。庾肩吾《和刘明府观湘东王书诗》曰：“羽陵青简出，妫泉绿字分。”⁹⁸（案：“妫泉绿字”即河图——《河图》称“黄帝游洛，至翠妫之泉，龙图兰叶，朱文授之”，《龙鱼河图》载“尧时，与群臣贤者到翠妫之渊，大龟负图来，出授尧”，因云。⁹⁹）又房玄龄等撰《晋书·文苑》时序谓“温洛祯图，绿字符其丕业”¹⁰⁰，薛克构《奉和展礼岱宗涂经濮济》言“龙图冠胥陆，凤驾指云亭。非烟泛济浦，绿字启河汀”¹⁰¹，相形之下，魏徵《享太庙乐章·大明舞》的“赤字浮河”¹⁰²虽遵循原说，反倒被大众衬托得与时流不合了。

有意思的是，“绿字”在唐宋的主要描述对象，比起河图，竟更多是套用在洛书上，这很可能是以“禹观于浊河，而授绿字”一说为中介展开的。《中候》此句原就是就禹受河图之事而言——“（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淫。’言讫，受禹河图，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渊。于是以告曰：‘臣见河伯，面长人首鱼身，曰“吾河精”，授臣河图。’”¹⁰³但《中候》亦云：“乃受舜禅，即天子之位。天乃悉禹洪范九畴，洛出龟书五十六字。”¹⁰⁴据此，则禹在庶或为臣时得授河图（绿字），即位之后得洛书（洪范九畴）。然而《汉志》载刘歆之见，认为“虞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¹⁰⁵，唐宋人大抵因循此说，认为禹所得的是洛书而非河图，于是便将不伦不类地《中候》的“绿字”冠到了九畴乃至洛书之上——

⁹⁶ 谢朓著，曹融南校注集说：《谢宣城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116-117页。

⁹⁷ 《全梁文》，载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020页。

⁹⁸ 逯钦立辑校，《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1991。

⁹⁹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谶纬文献》，载《两汉全书》第34册，页19640、19716。

¹⁰⁰ 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二，第2369页。

¹⁰¹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增订本）》卷四四，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50页。

¹⁰²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三一《音乐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30页。

¹⁰³ 《尚书中候考河命》，载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431页。

¹⁰⁴ 《尚书中候考河命》，载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432页。

¹⁰⁵ 班固：《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上》，第1315页。

	出处	文本
1	李峤《洛》	九洛韶光媚，三川物候新。……神龟方锡瑞，绿字重来臻。 ¹⁰⁶
2	叔孙玄观《洛出书》	清洛含温溜，玄龟荐宝书。波开绿字出，瑞应紫宸居。 ¹⁰⁷
3	戴栩《题雇恺之画洛神赋 欧阳率更书同宗御跋寿右 司》	原公翊我九畴主，更睹龟呈绿字书。 ¹⁰⁸
4	王阮《禹穴》	绿字煌煌锡禹畴，厥初龟负即天休。 ¹⁰⁹
5	杨万里《题曾世夫颐斋》	一朝浮洛书，绿字献禹畴。 ¹¹⁰

足见世人牵会之能事，一至于斯。

总结

先秦文献中的“绿图”，本应通作载录兴亡之名的“录图”甚或受禄于天的“禄图”，但必不包括膺次德符的“篆”——这与五德主运说的用世时机不合，更与绿色义项毫无相涉。然而在所用文字的影响下，最终却衍生为本无其事、义取绿色的河图形态兼别称——尽管这与先秦文化理念并不相契。而这种结果既然来自名与实间的牵强附会，也自然会存在着有迹可循的矛盾及破绽，这一点在河图色绿一说的发挥宣扬者——以“考命符授河”见长的《尚书中候》中即大有体现。

《中候》存世佚文所描述的河图形态，有“赤文绿错”、“赤文绿字”、“赤文绿色”三说，但再如何极言其“绿”，都无法动摇河图中由“赤文”载录内容的主体地位。反倒是“绿”明显地位尴尬，属性游移不定、少有共识，或曰“绿字”或谓“绿色”或云“绿错”，甚是随性，且其中“赤文绿字”所描述的既赤且绿之文字形态无疑极其矛盾，而规避了这点的“赤（文）而以绿色分其间”、“其文赤色而绿比（地）”另两说，也仿佛是为了牵会河图的“绿”之别称而勉强为之，必欲将绿色属性掺入其中耳。

¹⁰⁶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五九，第703页。

¹⁰⁷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八〇，第8909页。

¹⁰⁸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5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5110页。

¹⁰⁹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50册，第31128页。

¹¹⁰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42册，第26648页。

名实牵会下所衍生的河图“绿图”之名最初并非就其文字之色而言，是显而易见的。讖纬中持“绿”图一说者，至多也不过将兰绿介定为背景色，而文字始终是朱赤，故“绿字”一说其实并未经推敲。然而恰是这最不合情理的虚托之语，却成为后人印象最深、接受最广的说辞，原本显得随性、各式各样的绿属性，逐渐被统一为“绿字”。只能说，在“洛出丹书，河出绿图”的普遍认知下，由洛书文字色“丹”直接推想成河图文字色“绿”，是再自然不过了。甚至到得后来，“绿字”的名谓及形态还在禹受图或受书的纠缠间被附会、赋予到洛书身上。凡此种种，足见世人牵会之能事。

参考文献

-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 陈槃：《古讖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台湾：国立编译馆，1991年。
-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郭思韵：《汉代讖纬研究——以渊源流变、内容构成及对文史写作的影响为中心》，北京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
- 黄奭：《黄氏逸书考》，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20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胡渭：《易图明辨》，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
- 睢县悉达：《开元占经》，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
- 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 酈道元著，陈桥驿点校：《水经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 刘安编，张双棣校释：《淮南子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刘晓东等点校：《二十五别史》，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
- 刘昉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 陆贾著，王利器注释：《新语校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吕不韦等著，王利器注疏：《吕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
- 马骥著，王利器整理：《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 孟宪武、李贵昌：《殷墟出土的玉璋朱书文字》，《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 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孙贻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40页。

汪灏、张逸少等：《佩文斋广群芳谱外二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王重民原编、黄永武新编：《敦煌古籍叙录新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

韦昭注：《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吴毓江校注：《墨子校注》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谢朓著，曹融南校注集说：《谢宣城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颜昌晓：《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

张清常：《语言学论文集·续集》，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

赵一清：《水经注释》，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讖纬文献》，载董治安主编：《两汉全书》第33、34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周积明、张林川主编：《中华发明发现大典》，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年。

《侯马盟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